

汉语词语与

对外汉语研究

杨晓黎 / 著

HANYU

CIYU

YU

DUIWAI

HANYU

YANJIU

安徽大学出版社

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

杨晓黎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语对外汉语研究/杨晓黎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81110-254-3

I. 汉... II. 杨... III. 汉语—词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997 号

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

杨晓黎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开本	880×1230 1/32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 5108515	印张	9.5
	发行部 0551 5107784	字数	210千
E-mail	ahdxchps@mail hf ah .cn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责任编辑	高兴	印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978-7-81110-254-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杨晓黎，安徽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现任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曾任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外语系客座教授（1995-1997），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部汉语顾问（2000-2002）。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副会长、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华东分会理事、安徽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词汇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与文化等。



序

杨晓黎同志的论集《汉语词语与对外汉语研究》，共收录1981年至2006年发表的25篇论文，分成三个板块，可以概括成：汉语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作家作品语言研究；汉语民族特点和言语交际认同。25年的辛勤耕耘展现出三大块25篇，不称宏富，却见审慎务实。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在其教学本身，即“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有关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都应围绕“教学”这个中心，许多与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电化教学等都为该学科服务；许多与语言教学有关的学科，如汉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语言学教学等，也都为该学科所综合吸收；许多与“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相平行的学科，如汉语母语研究、外语本体研究、当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等，又都是该学科的借鉴和滋养，特别是汉语母语本体研究，是本学科的最亲密的相邻学科。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两个本体互相促进，互相砥砺。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成果会使汉语研究作换位思维，使之拓宽思路，使之更加深入细密；汉语本体研究又会使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更加贴近语言实际，使之把准汉语文化脉络，使之更加准确科学。杨晓黎同志的“汉语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专题，



正是在“两个本体”间寻觅其联结互补,寻觅其必然、自由过程,寻觅其丰富内涵和引申外延的劳作和科研实践。例如,作者对传承语素的研究就是一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本体研究看,“语素分析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教学实践告诉人们,“利用同义的常用词或语素对应解释词语中某个带有文言色彩的语素,是对外汉语教师经常采用的简便易行的词语教学方法”,但要是告诉留学生语素“足”可以相当于常用词“脚”,“赤足”可以同义替换为“光脚”,则留学生就会将“画蛇添足”同义替换为“画蛇添脚”,问题究竟何在?于是展开了十分必要的汉语本体研究来解决这样的错误类推。研究表明:传承语素在现代汉语中的构词多属书面语体,故只能说“足迹”、“涉足”,却不能说“脚迹”、“涉脚”;定了型的成语有稳定的传承语素,故只能说“手舞足蹈”,却不能说“手舞脚踏”;更普遍的情形是,传承语素在构词时要受相关因素的选择性制约,如熟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类成语)对构词要素各有选择,惯用语“口头禅”、“探口风”只能以固有的双音节词“口头”(本无“嘴头”)、“口风”(本无“嘴风”)进入;至于面广量大的非熟语词,对传承语素的选择取决于“历史的继承性”,如“男足”、“女足”、“国足”、“足彩”(足球彩票)取决于已有的“足球”(无“脚球”)的说法,而无“男脚”、“女脚”、“脚彩”的说法,“国足”是另一种意义。作者的结论是,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传承语素的相对稳定性,传承语素的文雅色彩决定了它的不可替代性。作者的深层理路,是在寻找从汉语母语研究通向对外汉语教学的中介。列宁在回答“科学应该从何开始”这样的问题时曾说:“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



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并把“从联系中分割出来的单独的事实”叫做黑格尔式的“存在”，而把“联系(概念)、相互联系、联结、规律、必然性”看做揭示对象内在规则的科学链(见列宁《哲学笔记》103、297页)。本论文集的主题之一，不正是要把捉两大“存在”对象：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母语之间的中介、“联系(概念)”、规律和必然性吗！

或许是和长期从事二汉教学和专注于一汉和二汉中介研究的经历有关，作者的学术视野开阔。立足于语义学、符号学研究作家、作品，这是有见地的尝试。用语言和语言学研究法来研究其他人文领域，乃至把一切学术研究归结为语言和语言学的研究，是当代西方学术的主潮。最典型的说法，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这里的“哲学”一词西方往往用以指所有的人文学术，“批判”即研究之意。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文艺理论家罗兰·巴尔特，他认为“个别作品是类似语言学中的言语的东西，是一种更加宽泛的抽象结构的具体体现。结构主义诗学和叙述学的任务就是要探寻支配文学作品的这种内在结构或‘总法则’。”(郑杭生《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336页)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几乎离不开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相关的文献学、文本学、解释学、文体风格学等。可以说将语言学科学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外文学界的新气象。关于颜色词的研究，早在1943年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语言理论基础》中就已见到(见该书英译本53页)。现在杨晓黎同志既研究颜色词语，又将其外延推广到形象色彩词，并用来具体研究鲁迅小



说词语中的颜色词和形象色彩词义。本来,外延的推广意味着学术的推进,进而将形象色彩词概念具体运用到鲁迅作品的研究,不能不说在思想方法上完成了一次“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维全过程。十分重要的是,在这“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过程中,并没有离开语言学自身的方法学。《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论析》一文中说:“鲁迅小说包括了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系列:黑、白、红、黄、绿、蓝、青、灰、紫。”“颜色词语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形象色彩义类聚。”这正是索绪尔理论语言学横向组合(syntagmatic relation)和纵向类聚(paradigmatic relation)对待研究法中的后者。

4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总是遇到跨文化交际问题。当我们引用洪堡特的话“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来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把这里的“世界观”理解成大字眼。而杨晓黎同志在汉语的民族性和汉语交际,即属性和职能的关系上,她的理解是具体的,可以感知触摸到的。围绕汉语言的民族性和交际职能的耦合关系,论文集涉及的问题有:从成语看汉民族的交际准则与道德规范中的讲“诚信”、“谨言慎行”密切相关;对言语交际的评价标准是看言语交际中有无修养和能力;言语交际技巧在于正确处理好“理与情”、“简与繁”、“直与曲”、“庄与谐”四大关系,应奉行中庸,做到“言谈适度”;汉语体态语,无论是传情体态、同义体态、综合体态、礼仪体态都有自己民族特色,应注重背景,举止得体。这四条,或许是汉语所反映的汉民族的“世界观”,它显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观”,倒是个实践理性规范。至于“V着”的研究,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尤其是表示情貌



(aspect, 体)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可见“V着”的研究也是为了说明汉民族的“世界观”的。

二十五年耕耘,仅有一年在南大。2005年9月,杨晓黎同志负笈金陵,随中文系国家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字学科导师组攻读博士学位,我有幸与之一共事和学习。这时,她已经升任安徽大学正教授。既已修成正果,何以自苦为极?曰:学无止境,修知不足,深造自得,其乐无穷。随堂听课,每欣欣然言有所获;课外交谈,举恬恬然悟知可取。鼓舞云何!策进云何!与共勉之。

是忝为序。

李 开

2006. 12. 28

序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1
汉语词汇发展语素化问题刍议	1
以性别语素“男、女”构成的词语及其类推问题	12
传承语素在现代汉语词语构成中使用情况的考察	28
仿拟型新词语试析	43
四音节新词语及其成因	50
略论成语的派生	59
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探论	66
对外汉语词语教学的拓展法	76
朝鲜中文教科书《图像注解千字文》的功能 定位及其启示	89
谈成语在鲁迅小说中的创造性运用	105
鲁迅小说中 AABB 式词语的巧用	113



鲁迅小说的体态词语解读·····	121
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论析·····	138
鲁迅小说中的冷、热词语·····	152
基于听觉的形象色彩词语探析·····	158
鲁迅小说词语的形象色彩义解读·····	172
试论张天翼小说的语言艺术·····	194
《桑青与桃红》用词艺术谈片·····	208
《红楼梦》成语运用二三例·····	217
标点与感情·····	223
从成语看汉民族的言语交际观·····	228
从成语看汉民族的体态语·····	240
试论汉民族言语交际准则·····	251
V 着前修饰成分的考察·····	264
关于“言语社区”构成基本要素的思考·····	277
后记·····	287



汉语词汇发展语素化问题刍议^①

一、语素化与汉语词汇的发展

陆俭明先生在谈到当前汉语词汇研究滞后的原因时曾指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不能割断源流，必须跟考察词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必须很好总结和继承训诂学方面的合理因素和某些分析方法，而不像语音、语法，可以只进行纯共时平面的研究。”^②汉语词汇系统源远流长，词汇成员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或承续古往，或引自域外，或造于当代，当我们观照这样一个庞杂的词汇系统并企图揭示这个系统的特点与规律时，仅仅采取惯常使用的静态的、共时描写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系统。我们知道，现代汉语词汇最显著的特点是词语构成的双音节化，而双音化并非自古如此，上古汉语词汇是

^① 本文曾在“语言与文化 2006 学术研讨会(银川)”上宣读，并在安徽省语言学会第 13 届年会(2006 阜阳)上讨论。

^② 见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以单音节词为主体的。汉语词语何时开始了它的双音化进程,学者们多有关注。我们认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词语构成本身要素的认识,也就是对词的构成材料——语素形成的研究。语素作为现代汉语词语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它的来源与形成的过程,与汉语词语双音化的过程相生相伴,密不可分。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大多数是由上古汉语的词演变而来的。从上古汉语的词转换为语素的过程,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语素化问题。语素化的发生是汉语词语双音化的自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语素化问题是汉语词汇发展研究最根本的问题。从语素化着手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汉语语素的特点,有利于揭示汉语词汇发展和构成的规律。

二、词的语素化及其形成条件

探讨语素化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构词成分的语素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征。我们认为,合成词中典型的构词语素具备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非独立性,即一般不单独使用,不具备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功能;第二,结合能力,合成词中语素的价值只在与其他成分结合时才能体现出来。至于语素中那种“能单用的,单用的时候是词,不单用的时候是构词成分”(吕叔湘 1979:19),这类语素之所以能作为词单用,是由于它们原本就是传承下来的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单用时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经历语素化的过程,只是以它原来的形态使用着。只有某个词与其他语言片段组合并发展成为一个合成词时,这个词才真正进入语素化



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作为构词成分的语素的“非独立性”与“结合能力”,是在语素化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失去独立性,它还是一个词,不是语素;如果某个成分虽然失去了独立性,却没有结合能力,它就不具备构词功能,只是一个因历史积淀而存在于某个词中的“惰性语素”,就不具有构词语素的一般性特征或典型性特征。

那么,作为构词成分的语素的“非独立性”与“结合能力”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认为,最早的环节可能就是短语的词化,即从一个短语慢慢变成一个凝固的词,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让两个相结合的词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如“民人”(《诗经·大雅·桑柔》)与“人民”(《诗经·大雅·抑》)、“介绍”(《战国策·赵策》)与“介绍”(《礼记·聘义》)、“朋友”(《论语·学而》)与“友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开始只是两个单音词的自由组合,前后也可以颠倒,类似现代汉语中的并列短语。经过若干时间的使用,两个成分慢慢互相依存,凝固性也随之加强,单独说“民”、“介”、“绍”、“友”、“朋”都不足以传达其相互依赖而形成的词义内容和色彩。正是随着短语凝固性的加强,组成短语的各个词的独立性渐弱,互相依存性增加,才得以完成由短语向合成词的转化。与此同时,原来作为短语构成要素的词也逐渐丧失其各自的独立性而获得了互相结合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在与别的词的互相结合中同样表现出来时,就使得原本是短语的构成要素的词实现了向语素的转变,语素的特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逐步显露的。也就是说,在词的结合过程中,当它发展到不仅和“原配”结合,而且以它为基本的元素,还可以同其他成分结合变成另外的词的时候,它



的功能就凸显出来,变为一个典型的语素了,比如由“介绍”而到“媒介”、“介意”,由“民人”而到“民兵”、“民谣”等等。

董秀芳(2004)通过对汉语双音词的历时考察,得出了从古代汉语短语降格而来的双音词是汉语双音词的主要历史来源,大多数双音词的产生是短语词汇化结果的结论。董秀芳所谓“短语词汇化”的过程,实际就是语素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语素化的过程。因为短语词汇化,表面看来是由一个短语凝固而形成一个词,是一个词化的过程,但透过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词化的过程实际就是短语中原来相互结合的各个词的身份降低,转换成语素的过程。短语之所以词化,是因为在长期凝固的过程中,构成短语的两个词各自的独立性丧失,互相依存性加强。词的独立性丧失,正是语素化的重要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短语词汇化的说法,只适应对早期词汇发展现象的描写,它仅仅说明了汉语中部分词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认为,只有揭示短语词汇化过程中汉语词汇构成的最基本要素——语素的形成和发展,对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关于语素化普遍发生的时段

语素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经历了原有语言单位作为词的功能的减弱直至退位,而作为一个构词成分功能的逐步增强直至定型的发展。从汉语词汇系统的整体发展来看,要揭示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对汉语词汇史上语素化现象普遍发生的时段的确定,也就是要确定在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过程中语素化是从何时开始大范围、普遍发生



的。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汉语词汇双音节化大量出现的时期也就是语素化普遍发生的时段。

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主体就是在先秦或上古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双音节化的历史进程而形成的。由上古汉语单音节词为主向双音节词为主过渡,这个过程与语素的形成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没有双音节化,就不可能有语素这个要素的产生。因为只有当一部分单音节词的功能转换成不能独立的构词成分的时候,语素的形成才具备相应的基础和条件。这个历史过程发生的时段,我们认为定在中古比较合适。^①也就是说,语素化的普遍发生应该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中古时期。

我们对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化普遍发生时段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汉语词汇双音节词的普遍出现是在中古时期。所谓双音节词的普遍出现,是指上古汉语的词由单音节转换为双音节这个现象的普遍发生。程湘清(2003)在对《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中的双音词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复音词为主的变化,虽从先秦就已开始,但其总体还是以单音节为主,上古汉语双音形式的数量相对较少。据程湘清(2003:87,105,182)统计,去掉专词、虚词等,单以一般双音词计,《论语》共180个,占总词数的12%;《孟子》共333个,占总词数的14.9%。而到了东汉的《论衡》,总字数21万,全书复音词

^① 关于中古汉语起讫时间的界定,根据一般的说法,我们采用从东汉至隋朝。



总数达到 2300 个；南朝宋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全书 6 万余字，复音词总数达到 2126 个。可见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双音词的数量增长迅速，并成为词汇丰富与发展的主要渠道。需要指出的是，“双音节”化与“双音词”不是一个概念，上古汉语的双音组合，严格说来很多只是短语。潘允中(1989:28-29)指出上古复音词的三个特点：一是两个语素仍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如“恭敬”，可合用，又可单用；二是语素次序不很稳定，如“恭敬”又可说“敬恭”；三是复音单纯词有时可以单个字出现，如“蝴蝶”——“蝶梦”，这是少数。王力(1981:86)也指出：“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的。这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固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单词。”同义词组合的不固定性，是先秦古籍中的常见现象，除上举诸例外，再如“心腹”（《左传·哀公十一年》）与“腹心”（《左传·成公十二年》）、“荡摇”（《左传·成公十三年》）与“摇荡”（《庄子·天地》）等，单音词之间的组合非常灵活。语素是构词的单位，上古汉语双音组合中的构成部分与我们所谈到的“语素”并不是一个概念。只有当双音组合逐渐凝固为词，其所构成的单位才可称得上“语素”。上述统计数据表明，这种由词向语素身份转变现象的普遍发生，应该是在中古时期。当一个单音词成为双音节词中的一部分，它的身份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就完成了从词到语素的身份转换。总之，词语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为语素化创造了契机，只有双音节化普遍发生，语素化才有得以形成的丰厚土壤。

第二，双音词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以语音造词为主到以语法造词为主的阶段，以语法造词为主是语素化发生